

中國東南沿海古代先民的海外文化拓展管窺

林華東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內容提要〕：古往今來，任何區域文化，抑或民族和國家，都不可能是孤立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是構成鄰近區域間相互交流的原因。棲息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史前先民及至先秦時吳越和漢初的閩越與南越民族，背靠亞洲大陸，面向太平洋，特定的地理環境，使之既具頻繁的內陸文化交流，同時又成爲中華文明向海外傳播的先驅。筆者不掩翦陋，願以管窺之見，就中國東南沿海古代先民的早期海外文化交往問題作一討論，以求教於方家。

一、先秦以前越人的造船業

大凡進行海外文化交流，總離不開水上交通工具，因之，我們必須率先對這一地區早期的造船成就進行一番簡要的回顧。

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七年，在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遺址中，曾先後出土有七支距今爲六〇〇〇～七〇〇〇年前的木船槳和一條廢棄後被利用來作板牆的獨木舟遺骸。一九七九年在浙江省桐鄉羅家角遺址中，也同樣發現了二條殘破的獨木舟〔註一〕，這均是迄今爲止中國最早的舟楫實物。其次，在江蘇省常州圩墩馬家浜文化遺址中，也有距今五〇〇〇～六〇〇〇年前的木船槳發現。到了良渚文化之時（距今四〇〇〇～五〇〇〇年），造船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在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杭州市水田畝遺址和江蘇吳江梅堰龍南遺址中都普遍出土有木船槳。從錢山漾和水田畝遺址出土的大船槳分析。前者槳葉長達九六·五、寬一九厘米，後者有的槳葉寬達二六厘米，其迎水面大，推力也大，從而可推知至遲在當時應已出現了筏和大型的

獨木舟。

商代以降，我們從以象形聞名中外的甲骨文「舟」字作「𦨭」、「𦨮」或「𦨯」，筆劃工整而對稱，聯繫到《史記·周本紀》載昭王南征渡漢水，命百姓造船，百姓恨之，故意制成膠船，結果船至中流膠液船解而喪身的記述，可以認定殷商之時已出現了小型木板船。逮至西周，造船已很普遍，從天子、大夫到士，常用舟船來表示身份等級，國家有時還設有「舟牧」、「蒼兕」等官職，來負責管理舟楫。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鐵器的使用，中國造船業有了飛速的發展，各諸侯國為爭霸稱雄，紛紛發展了水軍和戰船。尤其是地處江南水鄉的吳、越以及瀕臨江、湖、海的楚和齊魯等國，更以其擅長舟楫而著稱海內。越王勾踐曾自稱其民是「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吳國則被稱為是「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的國家，而齊國更享有「海上王國」之稱。當時的吳越兩國舟船規模大、種類多，不但設有舟師、大船軍和習流，而且戰船，還多命有專名。就其船體而言，有筏、獨木舟、舫和木板船，筆者還主張當時已出現了帆船〔註二〕。故至西漢時，中國的船隊便可遠航到了印度洋，因已有專文，此不贅〔註三〕。

正因為吳越有著悠久的造船業，所以學術界有人便提出早在距今三〇〇〇～六〇〇〇年前，吳越便同日本、台灣、美洲和大洋洲有了海上交通，這是必須認真辨正匡謬的。

二、聯結中朝日的「稻米之路」

吳越同日本的海上交往始於何時這一問題，主要是由研究傳入日本的「稻米之路」引起的。有學者認定早在六〇〇〇～七〇〇〇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之時，已同日本的繩文時代有了海上交通。也有人從河姆渡及其後續為代表的江南史前文化，諸如稱谷、干欄式建築、玉玦、漆器、木農具、木屐、半月形石刀（石庖丁），以及海流等等，來論證從河姆渡到良渚文化間，有一支「江南人」曾從海路遷到了日本。也有的主張日本彌生時代的環壕聚落、長脊短檐的高床建築、銅劍、墳丘墓、瓮棺葬、鬲形土器和絹等等，都是江南文化傳入日本的結果〔註四〕。

其實，研究海上文化交往，切勿忽視當時所能具有的地理知識，航海能力和傳播的機制，進行考古類型對比，自應擇取

制作複雜、階形制獨特的器物爲是，並結合兩地間某些相同或相近遺物、遺跡地理分布的連續性和年代的依次遞減現象來全面剖析。同時還應注意文化的共性與個性，以及相似生態環境下容易出現的文化趨同現象。

考古發現表明：玉玦並非以河姆渡文化最早，也非江南文化獨有。遼寧省阜新查海遺址就有七〇〇〇～八〇〇〇年前的玉玦出土，喀左縣山嘴子鄉道虎溝也有夏家店文化的玉玦發現，說明日本繩文時代的石玦（玦狀耳飾）應從遼寧經朝鮮傳入。再如漆器，雖然目前是以河姆渡的漆碗年代最早，但我們應看到至遲在夏商之際，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漆器就已盛行，而且在遼寧夏家店下層文化中也已出現漆器，所以日本繩文晚期的漆器由江南傳入之說難以成立。日本彌生時代的田木屐和木農具，不但和浙江寧波慈湖遺址所出年代相差達二〇〇〇～三〇〇〇年之久，而且形制也不相同（註五）。至如河姆渡與日本形同實異的干欄式建築，呈現出來的是文化的共性。把相距遙遠、年代相差很大的中日兩地個別類似器物來對比，研究方法本身就存在問題。

固然，河姆渡和羅家角都已出現了水上交通工具，但全屬小型獨木舟，更不可能說當時已有帆船和木板船。儘管山東長島曾發現過類似崧澤文化的陶釜（見下文），廣東曲江石峽遺址有與良渚文化類似的陶器、玉器和石器出土，但這是陸上文化傳播的產物，並非如某學者所說的海上文化交往所致（註六）。雖然舟山群島有河姆渡遺址第二、第一文化層和良渚文化遺址分布，可確認當時先民已涉足海上，然舟山群島緊挨大陸，勿需導航技能，絕不能與遠航日本列島相提並論。江南地區的土墩墓和日本彌生時代的墳丘墓，僅有相似的封土堆，而死者的葬具、葬式和隨葬品完全不同，顯非由吳越駕舟渡海傳入。日本佐賀吉野ヶ里的環壕聚落與中國常州武進淹城的形制也是大異其趣。事實上，日本帶有三重環壕的聚落不但在韓國慶尚南道檢丹里有發現，而且最近在福岡縣甘木市的平家川添遺址也已揭露出六重環壕的大型聚落（註七），故所謂日本的稻作文化由吳越先民從長江口直接渡海傳入之說無法令人信服。

其實，朝鮮半島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就同中國東北地區有著密切的文化交流，是悠久的中華文化傳入日本的文化橋梁，這已爲衆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然就傳入日本的「稻米之路」問題，我以爲山東半島很值得重視。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及至岳石文化遺址中，曾出土過有段石鏃、貫耳壺、玉鉞、玉錐形器，玉環、玉琮、半月形石刀、角質鶴嘴鋤等屬崧

澤至良渚文化遺物，長島縣廟島群島海域還發現過類似松澤文化陶釜，而在江南的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遺址也出土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陶背壺，浙江嘉興雀幕橋良渚文化墓葬中也有山東龍山文化陶鬲出土，足證長江下游至遲在松澤至良渚文化時，已同山東史前文化有了交往，因之山東棲霞楊家圈遺址發現距今四〇〇〇多年的粳稻遺存，當為長江下游稻作農業北傳的結果。而在朝鮮半島發現最早的稻谷遺存是在韓國南漢江驪州郡欣岩里遺址，年代為公元前一二六〇年，其次是朝鮮平壤市三石區的南京遺址，年代為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再其次為韓國扶餘郡的松菊里遺址，年代為公元前六〇〇年前後。此外，在韓國金海市府院洞和會峴里及陝川鳳溪里、晉陽大坪里、山清江樓里等地，也有無紋土器文化期的炭化稻米或印痕發現〔註八〕。日本早期的炭化稻米多集中在與韓國隔對馬海峽相望的九州北部發現，主要有福岡板付、曲り田和佐賀菜畑遺址下層，年代為公元前四〇〇～四五〇年左右。尤應注意的是，山東、朝鮮和日本發現的稻米都屬短粒型的粳稻，而日本以新出現稻作農耕和使用金屬工具為代表的彌生文化，是在九州北部率先孕育發展起來的，因此，日本的稻作農業由韓國傳入是可以定論的。

一九八九年嚴文明教授曾從山東半島、朝鮮半島和日本九州的生態環境、早期稻谷分布和年代序列研究，提出了傳入日本的稻米之路，「最大可能是從長江下游↓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九州再到本州，這樣一條以陸路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線，以接力棒方式傳播過去的」主張〔註九〕，近年又在大連的大嘴子遺址發現有距今三〇〇〇年前的粳稻遺存〔註一〇〕，嚴說可謂卓識。不過，有些跡象頗值得深思：首先，朝鮮半島最早的稻谷遺存是出土在韓國的欣岩里遺址，年代不但早於靠北部的朝鮮南京遺址，而且也比遼東的大嘴子遺址要早，如稻米由遼東傳入朝鮮及至日本，則年代上的逆轉現象難以解釋。同時遼東緯度偏高，早先傳承的農耕經濟是以種粟為主，缺乏充分的種植水稻的生態環境，而長島列島史前則主要是採集漁獵經濟。再者學術界公認有段石鏃起源於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時獲得空前發展，大致在新石器時代末至商代，江南地區出現了凹槽型有段石鏃，西周晚期至春秋又為凹槽形銅鏃所代替，爾後逐漸走向衰落。其器形發展演變序列是：隆脊形↓弧背形↓斜脊形↓台階形↓凹槽形。在珠江三角洲還出現有一種與台階形同時或稍晚的有肩有段石鏃。我們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先民曾出現頭部人工變形和拔牙及獵頭習俗，大汶口文化晚期

發現有弧背形、斜脊形和台階形共存的有段石鏹。同時在王因、呈子、大汶口遺址的一些墓葬中，「往往發現有朱土、紅燒土渣和朱色痕跡」的特殊現象〔註一一〕，迨至青銅時代早期，山東的大汶口和五蓮縣蘭玉村都已發現了凹槽形有段石鏹。而在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繩文時代晚期也流行拔牙之俗。尤其是朝鮮平壤至漢城一帶，也常有斜脊形、台階形和凹槽形有段石鏹出土，往南到漢江和錦江流域及光州、釜山一帶，則多為凹槽形和少量的台階形有段石鏹，其自北向南傳播和年代依次遞減現象明顯，以致傳入日本九州時則幾乎全為凹槽形有段石鏹（只福岡市內有少量台階形有段石鏹出土）。

《漢書·地理志》載，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民「田、蚕、織作」。《詩經·商頌》也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記述，而在殷代小型木板船也已出現。春秋時地處山東的齊國已通過海路由朝鮮輸入文皮、氈服等，《說苑·正諫篇》也載：「齊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綜上說明至遲在春秋時享有「海上王國」之稱的齊國，早已具備橫渡黃海到達朝鮮的航海能力。再從《晉書·五行志》所記的「孔子履」可知，良渚文化的木屐也早已傳入山東，朝鮮和日本所見的木屐當由此傳入〔註一二〕。再者，山東古為東夷居地，而東夷（如少皞）為鳥圖騰崇拜，也早為學術界首肯。《禮制·王制》稱：「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後漢書·東夷傳》也說東夷「喜飲酒歌舞」，而古文獻中則往往把倭人和南韓史事記在「東夷」條下，似也暗示其人系出自東夷。同時朝鮮和日本不但古代有鳥靈、鳥生信仰崇拜和文身習俗，而且馬韓人也是「俗喜歌舞飲酒」，「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即頭部人工變形）」；倭人更是「嗜酒」，「冬夏食生菜」，「男子黥面文身」。此外在山東大汶口、鄒縣野店、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和日本佐賀吉野ヶ里都發現有獵頭習俗〔註一三〕，吉野ヶ里遺址一〇〇二號瓮棺內壁，還見塗抹朱色的特殊現象。

上述跡象大多不見於遼東半島，這向我們透露出山東和朝鮮及至日本古文化的親緣關係。因此，與之同時或略有早晚的東傳日本的稻米之路應是：長江下游↓山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九州〔註一四〕（圖一）。至如秦代方士徐福率船隊入海訪求仙丹靈藥而到達日本之說，也正是從江蘇連雲港至山東琅琊一帶起航，橫跨黃海順韓國沿海一帶到達日本的，也可為我們上述的稻米之路作補證。

三、越人向台灣的海外文化拓展

自台灣與大陸分離，成爲我國東南海上的島嶼之後，由於她地處亞洲大陸與東南亞海島的銜接地帶，因之研究大陸與台灣的海上交往問題，便成爲我們打開中國古代沿海先民與太平洋島嶼文化圈奧秘的一把鑰匙。

台灣與福建隔海峽咫尺相望，最近距離僅一三〇公里，毗鄰的地理和相同的生態環境，尤其是越人嫺熟的操槳駕舟技藝，更使之成爲海上文化交往的先驅。早在一九四三年日本的金關丈夫和國分直一教授就曾指出，台灣的史前文化中有經過大陸東南沿海傳入台灣的南方要素。鹿野忠雄教授也主張「台灣先史文化的基層是中國大陸的文化，此種文化曾分數次波及台灣。」〔註一五〕。張光直教授還提出台灣「龍山形成期文化」是由大陸不同的地方先後渡海而來的主張。台灣著名考古學家宋文薰教授進而推測台灣的南島系民族（史前文化主人）從不同的故地，不同的時間來台後，割據自己的領域，保存或發展著自己的文化〔註一六〕。隨著海峽兩岸考古與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上述論點大多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

台灣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以位於台北縣八里鄉大坌坑遺址命名的大坌坑文化，距今年代約爲六〇〇〇～七〇〇〇年〔註一七〕。美國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認爲大坌坑文化的主人同大陸東南海岸的河姆渡文化一樣，「都是住在類似的自然環境中，從事農耕以外多種食物採集活動的同樣的早期谷物農民」。大坌坑文化的陶器，「器口中侈，常在唇下有一圈凸起脊條。與河姆渡的相似」〔註一八〕。William Meacham則推測台灣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一群演變自江西萬年仙人洞，也許還有廣東內陸的翁源和靈山，以及北越的一些遺址所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華南新石器時代中期地域性文化之一，可稱爲「越海岸新石器時代文化」〔註一九〕。也有學者明確提出早在大坌坑文化之時，大陸的東南和華南地區就同台灣有了文化交往。然就我看來，此說尚指少數漁民於惡劣天氣中在海上捕魚，不幸連船帶人被大風吹到台灣，當不可排除。但問題是有的學者是指族群有意識地遷居台灣，這樣就不僅應辨明其遷徙的原因（何以作出此冒險之舉），而且其故地文化也必然會在台灣原始文化中反映出來，故上述主張的證據尚嫌不足。事實上大坌坑文化呈現的所謂大陸史前文化因素，是因在兩地相似生態環境下，而出現相似的繩紋（器形並不相同）和漁獵採集活動，屬於文化的趨同現

象，何況當時先民所能具有的地理知識並不清楚，航海技能也不足以遠航。

如果說大坌坑文化同大陸已有文化接觸之說尚待今後的考古發現加以確認的話，那麼繼其之後分布在台北地區的芝山岩文化（下層距今年代約四〇〇〇～三〇〇〇年）和圓山文化（距今年代約四二〇〇～二〇〇〇年左右），以及分布在西海岸中、南部以繩紋紅陶爲主的牛罵頭、牛稠子（均距今年代四五〇〇～三五〇〇年之間，部分文化上限接近五〇〇〇年）和營埔文化、鳳鼻頭文化（均距今年代爲三五〇〇～二〇〇〇年），已同大陸有著海上交往則是勿庸置疑的事實。臧振華、劉益昌先生對此早有論證，令人信服。莊禮強先生也通過對福建閩侯縣曇石山文化的全面研究後指出，曇石山文化與圓山文化及鳳鼻頭文化中的陶器無論從製作質料、顏色到工藝，還是彩繪紋飾和部位都很相似，兩地所體現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很相近（註二〇）。在台北芝山岩、台中營埔里、台南屏東墾丁（距今年代約四五〇〇～三五〇〇年）等遺址中都發現過炭化稻米，說明其時的大陸稻作農業已傳播到了台灣。尤其是芝山岩、圓山卑南和鳳鼻頭諸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彩繪陶片、小石鏟、有段石鏟、有肩石斧、石鏟半月石刀、蚌器、貝殼飾品及幾何形印紋陶等等（圖二），都是浙、閩、粵新石器時代晚期及至青銅時代常見之物。如台灣所見的彩繪陶在浙南的瑞安山前山、（圖三）福建的壽寧、福安、周寧、閩侯縣石山、福清東張、廈門灌口等地都有出土。

黃士強教授曾列舉了芝山岩出土的彩繪陶和陀螺形木器、黑皮陶、紅衣陶、骨鏢、角質鶴嘴鋤和鈎狀器等等，同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同類器進行對比，因而認定「在台灣找不到芝山岩文化的祖型」，上述「要素不應是獨立發生的，而是傳播的結果」。「它的持有人來自中國東部或東南沿海，尤其浙閩地區的可能性很大」（註二一）筆者欲予補充的是，芝山岩遺址出土數量多而形制特殊的內底帶半環形鈕的器蓋，在河姆渡遺址第三層就有其祖型出現。（圖四）圓山文化和台東卑南文化遺址中發現的扁圓形帶一缺口的玉玦、玉管、玉環和玉耳飾等，都可以追溯到大陸史前江南文化中的同類玉器，前三種屢見於崧澤和良渚文化，而玉耳飾最近在浙江餘杭星橋鄉的兩座良渚文化墓葬中也有出土。（註二二）（圖五）。不過，我們並不能由此肯定芝山岩文化的主人是當時大陸族群直接遷居台灣的結果。盡管已有跡象表明良渚文化先民確曾與山東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先民發生過戰爭，導致良渚晚期先民被迫他遷，而且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和航

海技術都已有了長足的發展，具有向海外拓展的動力和條件。但如主張「在台灣找不到芝山岩文化祖型」，恐與史實不符。因上述所舉芝山岩的大陸文化因素並不佔主流，故芝山岩文化實應由大空坑文化發展演變而來。臧振華先生在論述台灣細繩紋陶文化來源時指出，不能僅據不同文化間器物特徵的比較，用「移民」或「地區演化」等單一的模型來作解釋，而必須從自然環境、人地關係和族群互動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過程作考量，才能獲得更具可信性的解釋。【註二三】此說頗有見地，值得重視。

除此之外，台東卑南文化墓地出現的拔牙、獵頭和西海岸中部番仔圓文化流行以陶器覆蓋死者頭部的習俗，和台灣各地常出的靴形石器及其後的干欄式房屋、紋身習俗等等，均應是大陸越文化傳播的結果。圓山文化和卑南文化屢見的那種外緣帶有四個小突缺（或稱花邊）的玦形耳飾，不但在廣西田東、鍋蓋嶺、平縣銀山、廣東曲江石峽和香港大灣遺址找到其淵源所在，而且在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中也有發現【註二四】。台灣習見的玉玦在福建閩侯黃土侖和廣東曲江石峽等遺址都有出土（圖六）。圓山文化出現的有肩石斧，更向人們昭示它同廣東沿海和香港地區的親緣關係。不過，我們應注意到台灣普遍發現的有段石鏟大多屬台階型和凹槽型，有的橫斷面呈梯形，也有少數近似三角形，顯屬有段石鏟晚期形式或變種，而且有的往往同有肩石斧、彩繪陶及至印紋陶共存，表明她同大陸文化交往的時間不可能太早。結合良渚文化之時已有了筏和大型獨木舟分析，筆者主張台灣與浙南、福建、粵東沿海先民的海上文化交往，最早當不超過距今五〇〇〇年前。

四、越文化對東南亞太平洋洋島嶼文化圈的傳播

台灣凌純聲教授在〈論夷越民族〉文中，曾指出從非洲東海岸起，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間各島嶼及至南美洲西海岸的各地土著文化中，至今尚保留有中國古代夷越文化的因素【註二五】。國外學者如柯靈頓（R. H. Codrington）、佛累則（J. G. Frazer）等眾多研究者，早年也曾提出過太平洋群島的民族在文化起源上，與西太平洋海岸民族有關。【註二六】顯然，對此問題的研究，理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早在一七六一年法國漢學家德吉尼斯（J. De Duings）就提出了中國人早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一千年就已到達美洲

（即「扶桑」）的主張。這一學術新論曾得到中國學者諸如章太炎、興公、陳志良、朱謙之等先生的支持。直到一九四七年韓振華教授的〈扶桑國新考證〉和一九六二年羅榮渠教授的〈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大作發表後〔註二七〕，上述觀點才在國內受到了強有力的批駁。

一九七五年冬，由於美國加利福尼亞海底發現了據說可能已沉睡二五〇〇年之久的所謂中國古代「石錨」後，因之這一早已否定的問題被重新提了出來。房仲甫先後多次發表了文章，率先對這曾有懷疑的石錨年代和國別進行肯定，進而主張它是三千年前中國殷人揚帆東渡美洲的物證〔註二八〕。然其論據都屬猜想推測之辭，並無實據，研究方法也成問題。石鍾健、楊熿、陳麗瓊等人也紛紛為之考證〔註二九〕，石氏認定距今三千年前地處中國東南沿海的越人船隊，已可駛向東南亞和南太平洋群島及至美洲大陸，北美發現的中國船錨，充分說明了這個事實。

而對此問題研究最為全面系統的要數衛聚賢先生長達百萬字的《中國人發現美洲初考》皇皇巨著〔註三〇〕，不過我們細審其所附的照片實證後則大生疑惑。如衛著所記在墨西哥出土的被認為是殷人東渡美洲後為表示不忘宗廟之意，在一陶片上刻下的二十三個「亞」字，其實應是陶器上的裝飾花紋。一九二六年秘魯利瑪發現所謂秦代徐福出海攜去的銀鑄「半兩」錢幣也大成問題。至如所謂墨西哥發現的漢玉璧和秘魯石壁上的「木武本」、「遂為紀」刻石紀名及所引《春秋》中的「六鷁退飛過宋都」之說，更有嘩眾取寵之嫌，蓋不足信矣。近年張小華在〈中國與大洋洲、美洲古代交往的探討〉文中〔註三一〕，更忽視了某些因用途或功能相似而呈現出的文化趨同現象，有的「物證」則是斷章取義，甚至是建立在學術界早已否定的基礎上，便作出四〇〇〇～六〇〇〇年前中國的夷人或越人已航渡美洲和大洋洲的論斷，著實令人驚詫。如被張文認定由美洲傳入中國的主要物證花生和鈎紋皮蠹蟲問題，浙江錢山漾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花生」，當時僅作外形鑒別，爭議很大，目前也未作籽粒或切片科學鑒定。而與「花生」共存的「芝麻」和「蠶豆」，前者已重新確認為小泡瓜籽粒，而後者則應為皂莢之類〔註三二〕。故其是否確為花生值得懷疑。倘我國在四〇〇〇～六〇〇〇年前已從南美引種花生，其後應有連續種植過程，而為古文獻所載錄，何以直至宋元間才有花生與番瓜、紅薯之類從海上諸國引入的記載？再如鈎紋皮蠹蟲原產美洲之說，也早被我國昆蟲學界否定，不能以此作證據。〔註三三〕

筆者在一九八八年即對上說提出商榷【註三四】，現在被用作「實證」的石錨，美國史學家已證實是十九世紀居住在加利福尼亞的中國漁民所遺，因之述上諸論便不攻自破。

一九九一年，美國俄勒岡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楊江先生又主張：「早在六〇〇〇年前，馬來—波利尼西亞人的祖先開始從中國的福建省出發，進行了長途的遷移運動。他們向南方進穿越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爾後分兩個方向遷移。一路向西，到達馬達加斯加；另一路向東，到達夏威夷和伊斯特島。東徙的年代表如下：距今六〇〇〇年前，到達中國東南部及台灣；距今五五〇〇年，到達婆羅洲、帝汶島；距今四五〇〇年，到達印尼所羅門群島新吶亞；距今四〇〇〇年，到達西密克羅尼亞群島；距今三五〇〇年，到達斐濟；距今三〇〇〇年，到達薩摩亞群島；距今一七〇〇年，到達馬貴斯群島；距今一六〇〇年，到達伊斯特島；距今一四〇〇年，到達夏威夷；距今一一〇〇年，到達新西蘭。」【註三五】遺憾的是，我們無法在楊先生提綱式的文中找到對此問題論證的詳細根據，而按我們對各地考古實物和文化人類學資料的認識來看，楊先生提出的遷徙年代等問題，也尚待新的資料加以證實。不過，楊先生提出西方研究東南亞與太平洋島嶼的學者，應與東方研究百越文化的學者之間，建立起緊密聯繫，加強中西方學者合作的呼籲，我們卻是十分贊同的！近年王大有等人又把美洲奧爾梅克玉器上的圖案，考訂為殷商文字，證明是殷末將領率眾東渡美洲，將中華文明帶到新大陸。【註三六】然奧爾梅克文化拉文塔（La Venta）遺址發現的玉版實屬圖案裝飾，並不是什麼殷商文字，龔纓晏先生已有匡謬【註三七】，此不贅述。

其實，研究海外文化交流既不能脫離嚴謹科學的考古文物實證，同時還應結合民族學、語言學、民俗學、體質人類學和造船與航海史等多學科研究，辨明文化的共性與個性，並借助某些自然科學手段，也許才能揭示歷史的原貌。

早年台灣楊希枚教授和助手曾對四十年代以前在河南安陽明殷墟祭祀坑中出土的四百具人頭骨研究，將大約二百二十五具較完整的標本劃分的五種類型。指出其中的第Ⅰ型（約八〇具）為典型的蒙古人種類型；第Ⅱ型（約三十八具）為太平洋尼格羅人種，與現代巴布亞人和美拉尼西亞人頭骨相似；第Ⅲ型（約二具）為歐洲人種，與現代英國人頭骨相似；第Ⅳ型（約五十五具）為愛斯基摩人種；第Ⅴ型（約五〇具）則懷疑與波利尼西亞人頭骨相近（但也可能是上述類型中的某一類女性頭骨）。然據韓康信、鄭曉瑛的研究結果，表明殷墟祭祀坑中的人骨最多的應為東亞成分，其次為北亞的，近南亞的實屬少

數。【註三八】

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便有不少民族學家、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通過對分布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上的南島語系諸語支的研究後，認定構成南島語母體的前南島語支發源於台灣，而其更早的淵源則可追溯到中國的大陸南部沿海。前南島語由台灣傳入菲律賓後，逐漸形成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支，並慢慢擴散到爪哇、蘇門答臘、馬來亞、越南等地。該語區向南移動形成中央馬來—波利尼西亞語；向東移動形成東部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爾後並廣布到密克羅尼西亞南部、美拉尼西亞東部及整個波利尼西亞。考古學家貝伍德（Peter Bellwood）則進一步指出：「公元五〇〇〇年後期由華南大陸（也許是浙江、福建）來的原始居民進入台灣，原始的南島語進一步擴展之前至少在台灣島使用了一〇〇〇年。在公元三〇〇〇年前後講原始南島語的民族進入呂宋島，前南島語（它是在台灣原始南島語消亡時形成的）分裂為台灣與馬來、波利尼西亞兩個語支，前南島語系的諸民族擁有馴化的豬、狗，能夠耕種水稻、粟和甘蔗。考古學的證據有陶器、樹皮衣、石器與骨器（收獲用的刀、拋射用尖狀器、石鏟）等」【註三九】。梁劍韜教授還就波利尼西亞語中的水神Tangaroa來源進行稽索，指出Tangaroa與廣州方言「疍家佬」讀音相近，而「疍家」應是古代閩越沿海「但」人之後，正是越人的一支，「疍民遷移到太平洋群島的年代，可能西漢至南北朝期間」【註四〇】。我們從中國東南沿海古代先民與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嶼文化圈的文化習俗、農耕方式和宗教信仰，如干欄建築、以水牛或象踏耕耨田，擅長舟楫、拔牙、文身、獵頭、食人、崖葬、占卜、蛇圖騰、鳥圖騰和祖先崇拜等等，也都顯示出較大的共性和親緣關係。

當然，研究海外文化交往的關鍵，是絕不能離開考古文物的實證，大洋洲的古文化並非單一來源，情況相當複雜。如分布在新幾內亞的穆紹島以東，波利尼西亞的湯加、薩摩亞以西，中間包括美拉尼西亞群島大部分地區在內的拉皮塔（Lapita）文化（公元前一六〇〇—前五〇〇年）的內涵，【註四一】雖有若干東南亞文化因素，但總體上與澳大利亞較為接近。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則與菲律賓的古文化有著親緣關係，且有自西向東及向南發展趨勢。而對此問題的研究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應首推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有段石鏟。

早在三十年代，對東南亞考古學和民族學素有研究的德國學者海涅，格爾頓（Robert Heine Geldern）就曾提出了有段石

鏹是台灣傳到菲律賓及蘇拉威西、波利尼西亞等南群島去的主張，並指出波利尼西亞有段石鏹及大洋洲的有些古文化應起源於中國。日本學者鹿野忠雄也認定波利尼西亞有段石鏹是由華南、華中的民族及文化移動而傳入，華南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但對東南亞、甚至對波利尼西亞都有關係。菲律賓的人類學和考古學家拜耶(H. O. Bayer)也贊同太平洋的有段石鏹是由菲律賓傳去，至於菲律賓則是由大陸傳去的。在海豐、香港以及福建南部和台灣等處的發現，都表明與菲律賓的確有關係的，菲律賓是這種石器傳入太平洋的通路。一九三八年林惠祥教授在出席「遠東史前學會第三屆大會」的論文中，也曾指出中國大陸發現的有段石鏹和台灣、菲律賓、甚至波利尼西亞的很相同。中國東南部的史前文化與華北有異，而和南方的馬來西亞以及波利尼西亞有關。林氏曾把有段石鏹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認為它首先發生於中國大陸東南區的閩、浙、粵、贛和蘇、皖一帶，然後北向傳於華北、東北，東南面則先傳入台灣及至菲律賓與波利尼西亞諸島。【註四二】

根據近幾年來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是有段石鏹的起源中心。【註四三】菲律賓的有段石鏹平面多呈梯形，器身兩側向內斜殺尤甚，橫剖面多為梯形，少數呈三角形，有台階和凹槽形，也有背部中間突一橫脊，再在中間琢一縱向凹槽的特殊器形，均屬有段石鏹的退化型式或變種(圖七)。拜耶先生認為菲律賓的有段石鏹，年代較早的屬公元前一二五〇年~公元前八〇〇年，較晚的約公元前五〇〇年~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然據一九七〇年羅·達夫(Roger Duff)的論著可知，呂宋島東南阿爾貝(Albay)的福克斯(Fox)和埃文吉里斯塔(Evangelista)的瓮棺葬中，仍然還有衰退形的有段石鏹出土，碳十四測定年代僅為公元一〇〇年，【註四四】可知其結束時間很晚。

印度尼西亞的有段石鏹見於東部的蘇拉威西島和爪哇島，有退化變異的台階形、凹槽形及斜脊形(圖八)，數量不多，從其橫剖面呈梯形和三角形看來，顯由菲律賓傳入，年代應更晚。

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亞諸島的有段石鏹均顯示出它由菲律賓傳入的親緣關係。按海涅·格爾頓的研究，知其在夏威夷、馬奎薩斯(Marquesas Is.)、社會島(Society Is.)、庫克群島(Cook Is.)、奧斯突拉爾島(Austral Is.)、塔希地島(Tahiti Is.)、及至大洋洲的新西蘭和查塔姆島(Chatham Is.)都有分布，(圖九)甚至在太平洋東部智利復活節島(Easter Is.)、以及南美洲的厄瓜多爾也有發現。大凡波利尼西亞諸島有段石鏹的特徵往往是器身長，中脊高、分段顯明，橫剖面有四角、

三角、圓形等，在大赫島還有一種在背面和正面都製成台階狀的有段石鏹，新西欄也有一種柄部之中分別琢一較寬的橫向弧形凹槽及一縱向窄槽，這也均屬有段石鏹的變種形式，年代應比菲律賓更晚。它曾在當地使用了相當漫長的一段時期，甚至直到西歐早期航海家發現這些島嶼時，有段石鏹仍然還是波利尼西亞諸島土著的主要生產工具。饒有趣味的是，不但其地有段石鏹還保留有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許多特徵，甚至連安裝捆綁有段石鏹的木器柄也同河姆渡文化所發現的很相似，只是其柄部多刻花紋裝飾，製作更精更高級罷了。

至於環中國南海文化交往問題，據 Terrien de Lacour Peris 考証，在公元前四二五—三七五年前後，印度航海者大都由馬六甲海峽、經蘇門答臘及爪哇之南，以抵中國海岸，輸入印度洋和波斯灣的珍珠、瑪瑙等物。H. H. G. G. G. 還主張中國的商人及移民早在漢朝業已定居生活於印度尼西亞。〔註四五〕又按《漢書·地理志》記載，番禺「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一九八三年八月在廣州象崗山發掘的南越王墓中，曾出土有一批珍貴文物，其中的大象牙器、犀角、銀器、玻璃器，以及瑪瑙、琥珀、水晶、玻璃等多種質料的珠飾，有些可能「是從中亞或南亞等地輸入的。」〔註四六〕筆者欲予指出的是，南越王墓中隨葬的銀盒，（圖十）其上下腹部壓印的花瓣式裝飾，幾乎與伊朗首都德黑蘭博物館所藏公元前四世紀銀盤（圖十一）完全相同。它和五枚經確認為非洲象齒的原支大象牙一樣，可能原產自古波斯一帶，爾後經中南半島商賈轉手，由海外貿易輸入的。而山東臨淄齊王墓出土的同類銀盒，似由南越國傳入，由此可印證《淮南子·人間訓》所記秦時的南越有「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之利史實。足見秦時同中南半島諸國的海上航線已開通是毋庸置疑的。近年在南海西沙群島的甘泉島上發現瓮棺遺址及有肩石斧（距今約三〇〇〇—二五〇〇年）等史前遺物和戰國、秦漢時期的文化遺物（圖十二），正是這條航線的有力注腳。〔註四七〕西漢武帝時的船隊之所以能遠航到南印度和斯里蘭卡一帶，應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但這也並非南海海上交通之始，據《韓詩外傳》、《尚書大傳》等書記載，早在周成王時，居住在交趾之南濱海地區的越裳氏，就通過重重翻譯（「九譯」或「三譯」）遠貢「白雉於周公。」《左傳·襄公十三年》有楚「奄征南海，以屬諸夏」之說。古本《竹書紀年》有越王派公孫隅向魏進貢舟、箭和犀角、象齒的記載；而在浙江鄞縣甲村石禿山出土戰國之時的

一件青銅鉞（圖十三），其上所鑄印的兩條兩頭相向，尾向內卷的龍圖像〔註四八〕，與越南東山一件銅斧上的圖像（圖十四）幾乎相同〔註四九〕，似同越地文化交流的產物。當然，中南半島諸國同中國華南地區的交往，至遲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根據傅憲國先生對華南有肩石器的研究表明，「有肩石器在廣東珠江三角洲發源後，主要是循中國南部海岸西行，經廣西而入雲南及中南半島諸國、馬來西亞及南亞的印度和孟加拉。」〔註五〇〕又據宋文薰教授對台灣及環中南海史前時代玦形耳飾研究可知，〔註五一〕玦形飾在中國華南、香港和台灣地區及越南、泰國、老撾、沙勞越、菲律賓等地都有發現，（圖十五）早期為玉或石質，玦身為帶一缺口的扁圓形，外緣有三或四個突塊或花邊，晚期為石、軟玉、玻璃或貝殼等的質料製成，玦身呈扁鈞狀，外緣突塊尖長如釘。一般認為它是起源於越南中部，但從廣東曲江石峽遺址、廣西田東鍋蓋嶺遺址、香港大灣遺址和浙江衢州西周墓所出屬早期類型的玉質玦形耳飾，似可認定中國的華南為其起源中心，爾後向浙江及環中國南海傳播的。再如越南東北文化和馬來亞等地普遍發現的印紋陶，尤其是韓槐淮先生在馬來亞柔佛州（Johore Lama）、哥打丁宜（Kota Tinggi）採集的一批印紋陶，韓氏認為「與近年中國東南沿海地帶發現之印紋硬陶成器，或碎片，其花紋極相同。同時又進一步指出：「可能殷商時代或稍後，我國燒制之印紋硬陶已在南洋交易。」〔註五二〕安志敏先生主張是當地制作的，「年代大體與我國東漢相當。」〔註五三〕彭適凡先生則正確地指出馬來亞的印紋陶具有明顯的兩重性，其中大多數表現出濃厚的土著特色，少數「時代大體相當西周甚或更早」的印紋陶與中國南方相同或相似。〔註五四〕然就我看來柔佛州所見的雲雷紋、蓆紋、曲折紋和菱格填線紋等，應屬中國南方特點的印紋陶，年代為西周晚期至春秋（圖十六）。結合筆者關於帆船出現於春秋戰國之說剖析，傳入馬來亞的年代當不超過春秋之時，即距今二八〇〇年前後。

綜上所述，本文小結如下：

1.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有著悠久發達的造船業，至遲在良渚文化之時出現了筏和大型獨木舟，而帆船的出現則始於春秋戰國。
2. 傳入日本的「稻米之路」應是：長江下游↓山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九州。
3. 大陸與台灣島的文化交往應始於四五〇〇年前。
4. 所謂中國與大洋洲、美洲的古代交往始於三〇〇〇~六〇〇〇年前之說不足信。中國越文化傳入台灣島穩定一段時期後，

在距今，三五〇〇年左右開始傳至菲律賓，可能在距今二五〇〇年前後又逐漸從菲律賓分別向東及向南傳播，大致在距今一〇〇〇多年前傳至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亞。

5. 中國華南與馬來亞的海上交往，約始於二八〇〇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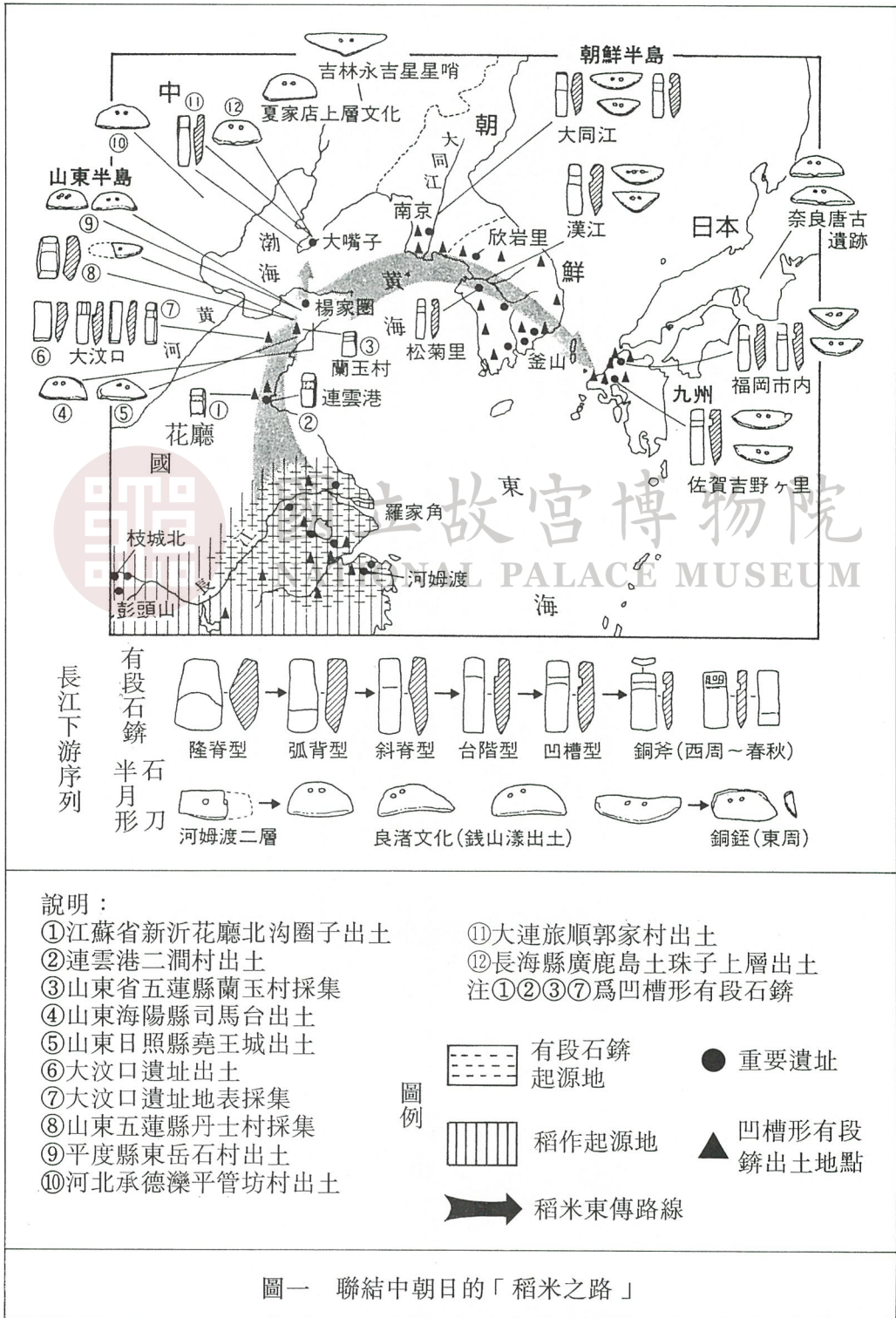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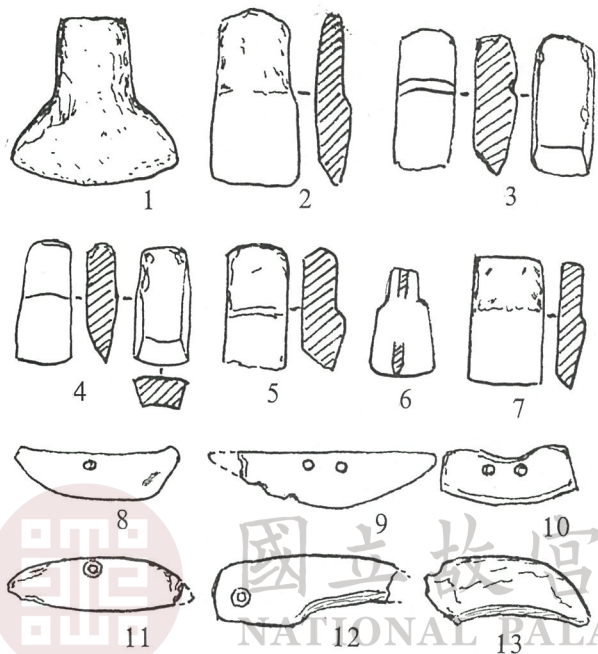
- 【註一】、【註四十三】：林華東著一九九二，《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四月出版。
- 【註二】：林華東，一九八六（中國風帆探源），載《海交史研究》第一期；Ling Hua-dang 1991, *On the origin of Sail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ailing Ships History, conference, Shanghai China, (Dec. 4th-8th, 1991).
- 【註三】：林華東，一九八九，〈試論我國先秦時期的造船業〉，載《中國水運史研究》第二期。
- 【註四】：安志敏，一九八四，〈長江下游史前文化對海東的影響〉，載《考古》第五期。安志敏，一九九〇，〈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載《考古》第四期。安志敏，一九九〇，〈日本吉野ヶ里和中國江南文化〉，載《東南文化》第五期。周南泉，一九八五，〈試論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載《考古與文物》第五期。王心喜，一九八七，〈江南地區遠古居民航渡日本試論〉，載《海交史研究》第二期。
- 【註五】、【註十二】：林華東，一九九一，〈話說木屐〉，載台灣《故宮文物月刊》九月號，總一〇二期。
- 【註六】：吳汝祚，一九九〇，〈開展史前時期海上交通的研究〉，載《中國文物報》一月十一日，總一一六期。
- 【註七】：見《西日本新聞》（夕刊）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又《讀賣新聞》（夕刊）一九九三年一月八日。
- 【註八】：沈奉謹，一九九一，〈韓國にわたる稲作農耕〉，出席日本第三〇回埋藏文化財研究會論文。
- 【註九】：嚴文明，一九八九，〈再論中國稻作農業起源〉，載《農業考古》第二期。
- 【註一〇】：吳青雲，一九九二，〈大連農業考古獲重大發現〉，載《中國文物報》十月十三日。
- 【註一一】：李錦山，一九八八，〈東夷原始宗教概述〉，載《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一輯，三秦出版社。
- 【註一二】：林華東，一九九三，〈吉野ヶ里遺跡にみられる首狩りのアジアの文化〉，載《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六七號，一九九三年七月版。
- 【註一四】：林華東，一九九三，〈中國稻作農業の起源と日本への傳播〉，載日本第三〇回埋藏文化財研究會出版的《各地域における米づくりの開始》第三冊，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四日日本福岡。

林華東，一九九三，〈中國・朝鮮・日本をつなぐ稲作の道〉，載《東アジアわ古代文化》七四號，一九九三年一月出版。

中國東南沿海古代先民的海外文化拓展管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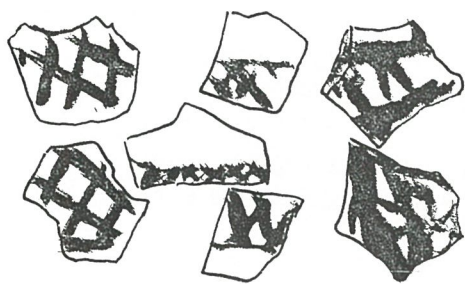
- 【註一五】：金關丈夫，一九四三，〈台灣先史時代に于ける北方文化の影響〉，國分直一九四三（有肩石斧、有段鏃及び黑陶文化），均見《台灣文化論叢》第一輯。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一九五五，《台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 【註一六】：參見劉益昌，一九八八，〈史前時代台灣與華南關係初探〉，載台灣《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
- 【註一七】：臧振華，一九八九，〈試論台灣史前史上的三個重要問題〉，載《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四五期。
- 【註一八】：張光直，一九八七，〈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載《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四輯。
- 【註一九】：轉引自注【註十七】。
- 【註二〇】：莊禮強，一九九三，〈曇石山文化的生產方式與鄰省區同期原始文化的異同〉，載《南方文物》第一期。
- 【註二一】：黃士強著，一九八四，〈台北芝山岩遺址發掘報告〉，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印行。
- 【註二二】：王云路，一九九三，〈餘杭再次發現良渚文化大墓〉，《中國文物報》，六月六日，東按：其墓年代屬良渚文化中前期偏早。
- 【註二三】：臧振華，一九九〇，〈略論台灣的細繩紋陶文化〉，載《浙江學刊》第六期。
- 【註二四】：【註五一】：宋文薰，一九八九，〈論台灣及環中國南海史前時代的玳瑁耳飾〉，載台灣《中央研究院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 【註二五】：凌純聲，一九七〇，〈論夷越民族〉，載《中國遠古與太平、印度兩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樓船的研究》，(台)中研院民族所專刊之十六。
- 【註二六】：R. H. Codrington: *The Melanesians, Studies in Their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 【註二七】：韓振華，一九四七，〈扶桑國新考證〉，載《福建文化》。
- 羅榮渠，一九八二，〈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載《北京大學學報》第四期。
- 【註二八】：房仲甫，一九八一，〈揚帆美洲三千年〉見《人民日報》十二月五日。
- 房仲甫，一九八三，〈股人航渡美洲再探〉載《世界歷史》第三期。
- 【註二九】：石鍾健，一九八三，〈古代中國船隻到達美洲的文物證據——石鎚和有段石鏃〉，載《思想戰線》第二期。
- 楊燁，一九八六，〈中華民族的海洋文化〉，載《海交史研究》第二期。
- 陳麗瓊，一九八六，〈銅鼓船紋補釋——兼論越人航渡美洲〉，載《中國銅鼓研究第三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 【註三〇】：衛聚賢著，一九八二，〈中國古代與美洲交通考〉，台灣新竹市說文書局出版。
- 【註三一】：張小華，一九八四，〈中國與大洋洲、美洲古代交往探討〉，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一期。
- 【註三二】：游修齡，一九九三，〈蠶豆的起源和傳播問題〉，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十二卷第二期。
- 【註三三】：朱弘復等，一九七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出土的昆蟲屍體〉，載《考古》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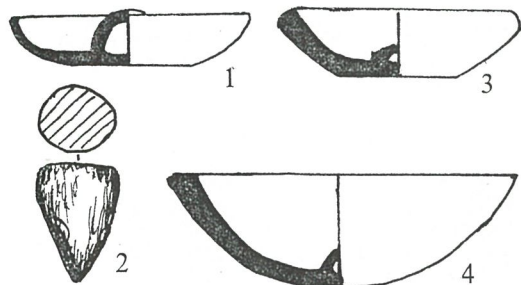


圖二 台灣發現的有段石
鏃、有肩石斧、石
鏟和半月形石刀

- 1.芝山岩遺址出土
 - 2.3.4.台北採集
 - 5.7.圓山護國神社採集
 - 6.圓山採集
 - 8.9.台中竹山採集
 - 10.台中大馬璘採集
 - 11.台灣高雄桃仔圓採集
 - 12.13.台東縣都巒採集
- (資料來源：金關丈夫、
國分直一著：《台灣考古
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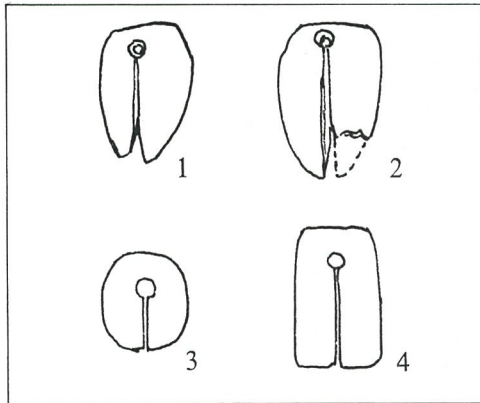


圖三 浙江瑞安山前山
發現的彩繪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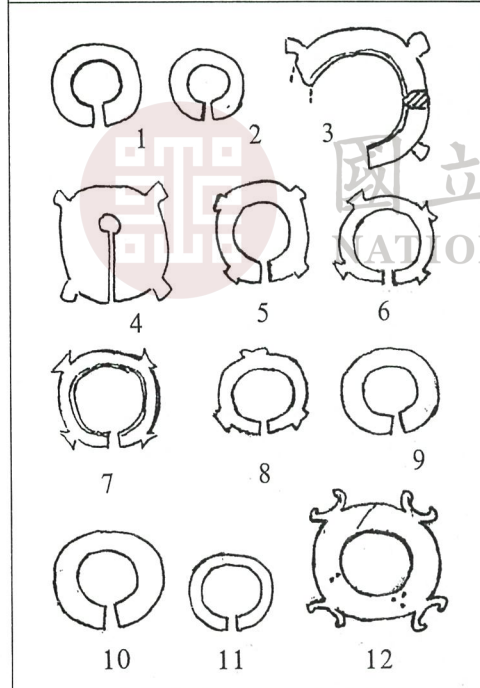


圖四 河姆渡和芝山岩出
土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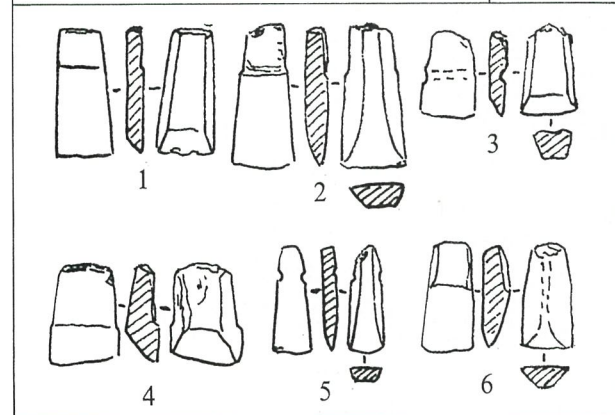
- 1.河姆渡出土的陶器蓋
- 2.河姆渡出土陀螺形木器
- 3.4.台灣芝山岩出土內底
帶半玻鈕的器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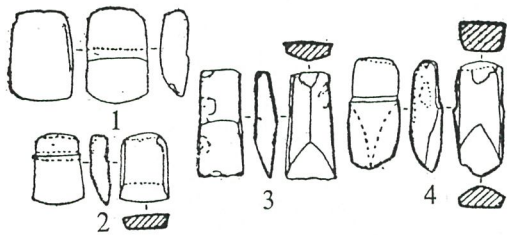
圖五 良渚文化和卑南文化遺址出土玉耳飾
 1.2. 浙江餘杭星橋鄉出土
 (1.上端寬1.4,縱高2.6,厚0.5厘米)
 3.4.台灣卑南遺址出土



圖六 台灣、福建、廣東出土玉玦和玦形耳飾
 1.2.3.台灣芝山岩遺址出土
 4.5.台灣卑南遺址出土
 6.台灣綠島油子湖遺址出土
 7.台灣蘭嶼出土
 8.9.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出土
 10.福建閩侯黃土侖遺址出土石玦
 11.12.廣東曲江石峽遺址出土
 (資料來源：
 a.宋文薰文 (見註24)
 b.《考古》1984第7期
 c.《文物》1984第4期
 d.《文物》1978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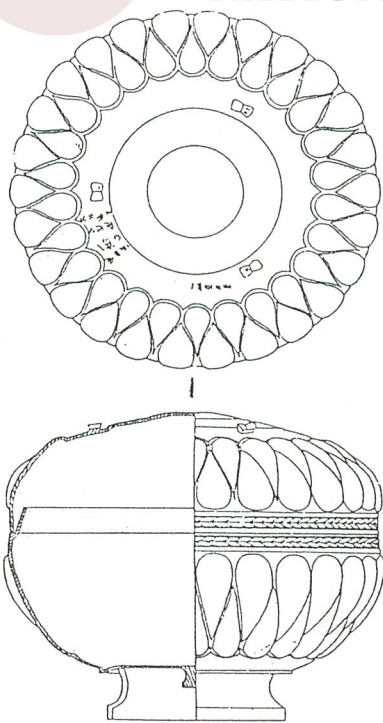
圖七 菲律賓發現的有段石鏃
 1.3.4.巴丹喀 (Batangas) 出土
 2.5.6.阿爾拜 (Albay) 出土
 [資料來源：
 a.林惠祥文 (見註42)
 b.傅寬國文 (見註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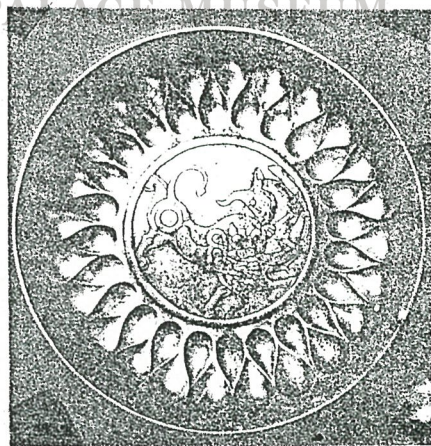
圖八 印度尼西亞出土的有段石鏃
1.2.4蘇拉威西出土
3.爪哇出土
〔資料來源：林惠祥文（見註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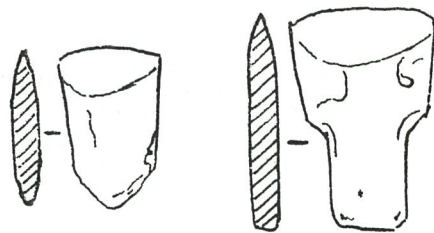
圖九 玻利尼西亞及新西蘭出土有段石鏃
1.2.5.7 夏威夷出土
3.6.新西蘭出土
4.大赫島出土
〔資料來源：林惠祥文（見註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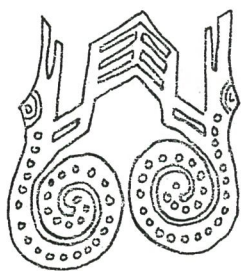
圖十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銀盒



圖十一 伊朗德黑蘭博物館珍藏銀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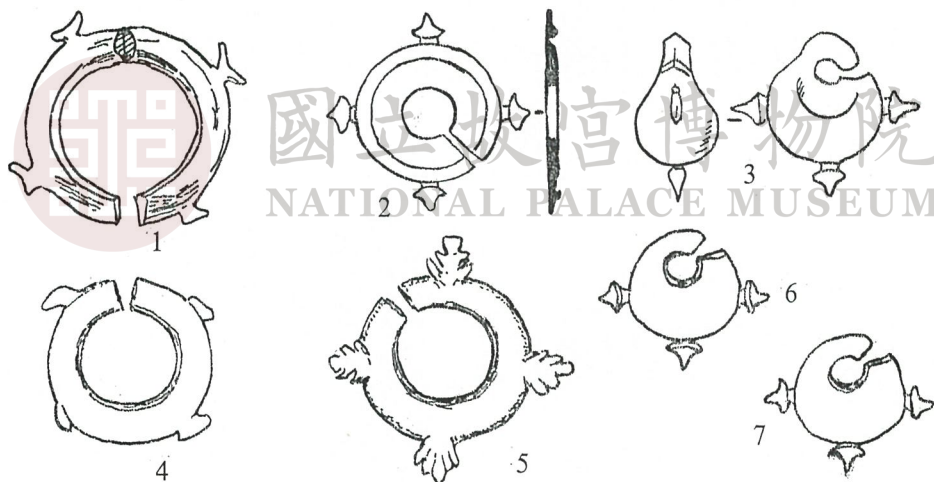
圖十二 西沙群島甘泉島出土石器
1.有肩石斧 2.石斧



圖十四 越南東山青銅斧上圖案（河內博物館，編號I.19661）



圖十三 浙江鄞縣甲村石竄山出土銅鈸（拓片）



圖十五 環中國南海發現的玦形耳飾

1.台灣蘭嶼朗島村發現

2.3.越南中部Sa-Huynh文化發現

4.5.6.菲律賓巴拉望島出土

7.沙勞越尼亞洞穴出土

〔資料來源：宋文薰文（見註24）〕



圖十六 馬來亞柔佛州發現具有中國南方特點的印紋陶

Cultural Contact Between Southeastern Chinese and Overseas Peoples in Ancient Times

Lin Hua-dong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try to reconstruct the initial overseas expansion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southeast coast to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My research is based on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Hemudu, Liangzhu, and other localities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and employs new findings from ethnographic and ship-building studies. The four main findings of my inquiry are as follows:

First, rice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from China's Lower Yangzi river valley through the Shandong and Korean Peninsulas to Kyushu Island.

Second, China's culture on the southeast coast began to expand overseas to Taiwan around 3,000 B.C.

Third, there is no solid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assertion that cultural contact among China, Oceania, and the Americas began 3,000 to 6,000 years ago. I hav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Yue cultur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Taiwan and then spread to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C. Yue culture continued to expand eastward and southward in the sixth century B.C. and reached Polynesia sometim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D.

Fourth, sea traffic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began 2,800 years ago.

Keywords: Southeastern Chinese 中國東南沿海

Hemudu 河姆渡

Liangzhu 良渚

Korean Peninsulas 朝鮮半島

Taiwan 台灣

Malay Peninsula 馬來半島

Yangzi River 長江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Antonio C. Tavares.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六七 through 八八。